

「中國夢」背景下的台日關係與角色互動¹

龔祥生

助理研究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所

摘 要

本研究範圍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2 年提出「中國夢」為起始，習定義其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至 2020 年 8 月時任日本總理安倍晉三因健康因素二度請辭為止。研究目的在於觀察此期間內台日雙方在這情境背景下如何調整自身角色，並從互動中發展出怎樣的雙邊關係。台灣和日本的共通點使得台日在維繫雙邊關係並因應「中國夢」壓力時具有其值得研究的特殊性。本文以「角色理論」將國家化約為「個人」，將台日關係界定為「角色互動下的過程與結果」，認為雙方各自的角色決定彼此互動的動機和建構起最終相互關係的呈現。本文發現「中國夢」的提出是台日互動深度在安倍二次執政時得以超過其個人前一任期的的關鍵點。因為台日共同面對中國「民族主義式政經權力擴張」實質影響，這使得台日在各自發展出基於民主價值和地理位置的獨立角色時，又能在美國以「印太戰略」抗衡「中國夢」的助攻下，加強台日對彼此互動角色的共識和認同。

關鍵詞：中國夢、角色理論、台日關係、民主價值、海洋國家

¹ 本文初稿曾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20 年會「國際關係的挑戰與趨勢：面對一個去全球化的亞洲與世界？」發表，感謝評論人何思慎教授對本文的建議指教。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Role Inte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Dream”

Shan-Son K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start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in 2012, and ends in August 2020 wh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esigned for the second time due to health reason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how Taiwan and Japan adjust their roles in this context during this period. Further, explore what kind of bilateral relations develop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make Taiwan and Japan have their particularity worthy of study in maintain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the pressure of the “Chinese Dream.” This article uses the “role theory” to reduce the state to an “individual,” and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role intera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two parties determine the motive of mutual interac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inal mutual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hinese Dream” is the key point that allowed the depth of Taiwan-Japan interaction to surpass his personal previous term in Abe’s second administration. Because Taiwan and Japan are facing th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f China’s “nationalist expans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When Taiwan and Japan developed independent roles based on their democratic value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they also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 the “Chinese Dream” with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s help strengthen Taiwan and Japan’s consensus and recogni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active roles.

Keywords: *Chinese Dream, Role Theory, Taiwan-Japan Relations, Democratic Values, Maritime Country*

壹、緒論

本文探討台灣和日本雙方在同時面對中共因素時，如何建構相互間的外交關係。研究範圍以 2012 年習近平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的展覽時提出「中國夢」並定義「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為起始，至 2020 年 8 月時任日本總理安倍晉三因健康因素二度請辭為止，觀察此期間內台日雙方在這情境背景下如何調整自身角色，處理與之相應的雙邊關係。因此，「中國夢」本身涉及歷史、地緣政治、民族主義、中共國力等多面向的涵蓋隱喻，被本文用來隱喻 2012 年後台日必須共同面對的中共因素背景。台灣和日本的共通點在於，具有在東亞第一島鏈直接面對中共勢力擴張的壓力、安全上依靠美國、與中共經貿往來密切、民主自由政體等，使得台日在維繫雙邊關係並因應「中國夢」壓力時具有其值得研究的特殊性。而關於台日關係中也極為重要的美國因素影響，則融合在台日各自角色建構過程中一併探討。

關於「中國夢」的定義，習近平曾於第十二屆人大上闡明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基本內涵，這代表跨越了個人、民族和國家等層次，且必然需要透過在與自身過去和國際上比較後，才能展現出其自稱的制度優越性和達成了偉大復興。有學者從中共黨政軍頂層的角度解構「中國夢」的提出，認為首先這代表習近平結合民族主義，不再掩飾富國強兵的企圖，要在國際社會上重構「共產英雄」的形象；其次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則是正式化中共「負責任大國」的理念，並以此和「美國夢」競爭，甚至讓「中國模式」得以輸出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新典範；第三是透過實現「中國夢」的實踐更積極捍衛主權和試圖制定新的國際規則，這包含爭議領土、地緣政治和國際經濟等多層面。²故從定義而言，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是基於民族主義而生，以物質基礎為根本，再以外顯出的復興形象和成果為目標，而對於國際會產生影響的正是其追求外顯成果的過程，或可直白稱之為「民族主義式政經權力擴張」。

² 沈旭暉著，劉永艷、爾雅譯，《解構中國夢 - 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Dream: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頁 286-306。

「中國夢」做為預設的問題背景，從表面上看目的為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除了在民族主義方面滿足對於古老中華帝國的富國強兵憧憬之外，其實質意義乃在於將中共的影響力回復到「朝貢國體系」時代的「海洋強國」勢力範圍，這點也使台日首當其衝且無可迴避地同樣處於面對中共的第一線。習近平曾在 201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宣示：「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實施這一重大部署，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³ 故本文所設定的「中國夢」包含追求中共實力增長的「富國強兵」和攸關東亞權力格局的「海洋強權」二點，這二點乃是後續本文藉由角色理論建構台日關係互動圖像的重要參考背景，台日各自角色鑲嵌於其中展現。

而「中國夢」和台日之間分別有其歷史淵源，日本於室町幕府時期曾屬於對明朝的朝貢國之一，之後雖於豐臣秀吉時期已在朝鮮半島和明朝進行對等的軍事交鋒，但中共若回復鼎盛時期的勢力範圍，將不利於日本於東亞區域的發展。台灣則是在清朝施琅擊敗明鄭政權接管台灣後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但卻在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給日本，親身經歷了中日國力的逆轉。在中共建政後，台灣在「反攻大陸」和對岸「解放台灣」間拉扯，至習近平上台並提出「中國夢」後，逐步加強訴諸民族主義促進兩岸統一的力度。故台日對於「中國夢」的對應，有其各自的歷史記憶作為根源依據，而非面對全然陌生的事物。

本文依據角色理論（role theory）將台日關係界定為「角色互動下的過程與結果」，認為雙方各自的角色決定了彼此互動的動機和建構起最終相互關係的呈現。而後續分析流程將先針對本文研究途徑之角色理論進行研究回顧，界定分析概念，第三部分以此界定日本和台灣各自獨立角色之自我建構，這包含雙方對於自身的獨立角色建構，第四部分探討台日的雙邊互動角色如何形成並影響雙邊關係的建立，最後於結論探

³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網》，2013 年 3 月 18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18/c64094-20819130.html>；〈習近平：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 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人民網》，2013 年 8 月 1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01/c64094-22402107.html>。

討在共同面對「中國夢」背景下，雙方的獨立角色和互動角色之間是否有衝突和如何切換的機制。

貳、角色理論的概念與意義

角色理論應用在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中已近 40 年，從角色理論的整體發展脈絡而言，歷經了三個不同的節點後，逐漸使理論應用及內涵更加精緻。其應用在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則是由郝斯提（K. J. Holsti）於 1970 年對外交政策中國家角色概念的研究開始引起廣泛關注。⁴ 角色理論發展至 1987 年為第二個關鍵點，角色理論的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和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理論的融合使用在《角色理論與外交政策分析》（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一書中奠定初步基礎。⁵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於 2012 年時的特刊，完全從純理論層面解釋或結合實證案例分析探討角色理論的應用發展，藉以證明角色理論可整合重視代理人（agency）個人層次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從建構主義觀點重視結構層次的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⁶ 而這也是該理論的第三個發展節點。

角色理論是本文的理論途徑，其學理定義是研究者依據化約後的國家內外條件對研究對象所做出的「比喻」，並不一定要由國家或領導人精確使用過該角色為自稱，如黃瓊萩研究指出因為國家的角色概念不是主觀決定的，而是主體間定義和實踐的，作為分析隱喻的角色可以充當身份的中介，並能代為呈現國家特色。⁷ 故角色理論強調角色間的互動，這來自他者（alter）的角色行為表現和自我（ego）的角色行為表現之間，兩者的行為基於規範、文化、制度、團體地位而展現。⁸ 在角

⁴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September 1970, pp.233-309.

⁵ Stephen G. Walker,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⁶ Cameron G. Thies, Marijke Breuning, "Integrat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1, January 2012, pp. 1-4.

⁷ Chiung-chiu Huang, "Interpreting Vietnam'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Independent Role Versus Interactiv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4 Issue. 4, February 2020, p. 526

⁸ K.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Stephen G. Walker,

色理論中，將國家化約為「個人」，使國家角色既非單純受國際結構或者官僚、政治菁英個人層次決定，而是結合國家內在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客觀物質條件和歷史記憶之初始自我，與外在國際社會中的他人（國）互動以了解本身所處位置和相互關係，最終角色的呈現方式往往是國家領導人言論或是國家政策行為。

一、國家角色認知（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NRCs）

郝斯提認為國家角色認知會明確影響國家個別行動，他將此概念定義為「可視為決策者所制訂的一般性決策、承諾、原則，與適合國家採取的行動，以及在各種地理和問題的背景中所應發揮的功能……角色也是國家對於外在世界以及體系、地理與經濟變數的基本傾向、恐懼與態度之反應」。⁹ 角色認知的根源包含國家特性（內部）和他者的角色期望（外部），前者包含國家的地緣位置、資源、能力、意識形態、歷史傳統、公眾輿論和領導人個性；後者包括體系結構、條約義務、國際法原則、非正式關係和國際輿論等因素，國家正是透過綜合內外部層次來源的理解詮釋，形成國家的自我角色定位。¹⁰

（一）角色建構（role making）

角色建構主要是基於對自己身份認同而來，演員（個人）的自我決定角色扮演的的方式，他者或者觀眾的回應只在有限的程度上起作用。應用在國家則是政策制定者對於國家角色認知的界定，將影響其角色和相應的政策行為。以哈寧奇（Sebastian Harnisch）的分析為例，他發現在毛澤東執政初期時自我定位是與蘇聯相同之工人階級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並以此角色認知之介入韓戰，但在中蘇衝突之後，將自我界定轉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角色，藉以和蘇聯有所區隔。但又因為清末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受害者記憶，故在反蘇之後並沒有選擇親美，而是走上了第三條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¹¹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

⁹ K. J. Holsti 著，李偉成、譚溯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159。

¹⁰ 徐正源，《中國負責任大國角色的建構：角色理論視角下的實證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0；龐絢，〈國際角色的定義和變化——一種動態分析框架的建立〉，《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43卷第1期，2006年，頁133-134。

¹¹ Sebastian Harnisch, "China's Historical Self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in Harnisch, Sebastian, Sebastian Bersick,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二) 角色替代 (role taking)

角色替代往往被包含在角色建構過程當中，但這特指當把角色鑲嵌在社會互動中時，角色建構意味著重新建構自身角色，會從相反角色（如老師相對於學生）或相應角色（如老師與助教）開始，藉由角色替代從自身或相對等正反二面的身分，去設身處地之觀察和假設該角色應有之行為而逐步調整，最後完成角色建構過程。¹² 例如，石之瑜從「角色建構」和「角色替代」切入，比較中共建構之自身國家角色認知與一般觀察家所界定有不同之處。¹³

二、角色衝突 (role conflict)

國家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同時具備多種身分，故角色衝突往往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自我）期望與他者的期望不相容時，或者一個國家必須面對許多相互不相容的角色或內部角色競爭時。¹⁴ 以下就這兩種角色進行介紹。

(一) 獨立角色 (independent role)

獨立角色主要依循前述的角色建構而來，根據郝斯提的定義，這種角色的主要屬性是僅根據其國家利益做出決策，這種獨立角色的戰略計算過程是基於自我的。¹⁵ 決策者對外部結構的解釋形成對大國權力等級關係的行動和反應，在獨立角色概念下對層次的解釋是基於物質 (material-oriented) 的，這意味著對權力差異的評估是基於物質資源，尤其是軍事和經濟能力的計算。¹⁶

Roles :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pp. 40-42.

¹²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January 2012, p.49.

¹³ Chih-yu Shih, "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 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January 2012, pp. 71-91.

¹⁴ Chiung-chiu Huang, "Interpreting Vietnam'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Independent Role Versus Interactiv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4 Issue. 4, February 2020, p. 529

¹⁵ K.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Stephen G. Walker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¹⁶ Chiung-chiu Huang, "Interpreting Vietnam'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Independent Role Versus Interactiv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4 Issue. 4, February 2020, p. 529

(二) 互動角色 (interactive role)

互動角色與獨立角色不同之處在於主要根據角色替代而來，互動角色比獨立角色更具關係性。這種角色強調雙方在不對稱結構中角色承擔和相應的責任。在互動角色邏輯下，雙邊關係穩定（儘管仍然是不對稱的）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證，從而使弱方可以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互動角色的概念可建立在兩個參與者之間在不對稱關係中的互動基礎上，要求角色扮演者不斷地根據對他人重要動機和對其行動的感知來重新調整策略。¹⁷ 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大國雙邊關係被認為是積極和有希望的時候，互動角色將選擇犧牲眼前明顯的利益，以維持長期穩定關係並保持等級制度的秩序。¹⁸

三、台日關係研究與角色理論

2012 年後對於台日關係研究可分為以下幾類，首先是從探討台日關係的影響因素的類型，例如過子庸研究發現「311 大地震」使得日本民間的感激之情得以向上延伸至政治人物，一時促成台日之間的交往突破，但仍不足以動搖日本根本的對台政策，除非重新世界進入冷戰或爆發戰爭。¹⁹ 其次是以國家屬性探討台日之間的互動，例如上村威從政治文化分析中日雙邊關係，認為兩國間的誤解不僅僅是因為兩個不同政治文化所造成的，還包括個別政治家為了個人政治利益刻意犧牲中日友好，以及媒體刻意炒作；李世暉從台日同屬「海洋國家」的角度切入，使得雙方得以有利益合作但也有重疊競爭的面向，並不因屬性相同就一帆風順。²⁰ 第三種則是從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發，兼論及台日關係發展，例如丹羽文生的研究則是認為安倍晉三的外交政策延續自其外公前首相岸信介的傳統理念，並從共有民主人權價值的角度加強與台灣關係。²¹ 第四種則是將台日關係至於多邊關係或有明確第三國影響之下分

¹⁷ Ibid. p. 7.

¹⁸ Ibid. p. 12.

¹⁹ 過子庸，〈日本「311 大地震」十週年臺日關係之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第 19 卷第 11 期，2021 年 11 月，頁 90-109。

²⁰ 上村威，〈中日關係：以政治文化為分析框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五十二期，2018 年 12 月，頁 149；李世暉，〈臺日關係中「國家利益」之探索：海洋國家間的互動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八卷第三期，2017 年 7 月，頁 1-40。

²¹ 羽文生，〈安倍外交と台湾 — その政治的系譜 —〉，《問題と研究》，第 47 卷 2 号，2018 年 4、5、6 月，頁 163-164。

析，如賴怡忠的研究將台日關係分別置於台日中三角和台美中三角下觀察，其研究雖然也正視中共因素的重要性並與之和美國等量齊觀地放在外在因素做比較，但卻發現在中美對峙態勢強烈時，美日同盟勝過兩岸關係，更能影響日本和台灣正面交往合作的意願。²²但相反地，何思慎和楊雯婷的研究指出，台日關係的發展深受中日關係和兩岸關係的制約，無論日本與台灣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多麼密切，中日關係正常化後所造成的「七二年體制」都持續制約和影響著日本，使其必須顧慮中方的立場和感受，即便是美國願意打破既有「一中政策」也難以鬆動日本的堅持。²³

透過角色理論可補充上述研究脈絡中，關於國家屬性和多邊關係等二面向如何影響台日雙邊關係的研究。首先經由界定台日各自的獨立角色和雙邊關係中的互動角色，有助於釐清何種屬性能夠幫助理解雙邊不同面向的合作基礎。另一方面，建構角色的過程中，可以藉角色理論的應用適當地融入重要「他者」，而不至於忽略掉雙邊關係以外如中共和美國等外在因素對其角色的影響。

參、日、台各自的獨立角色

台日雙方依據其各自的地緣政治位置、國力稟賦決定其國家利益之所在，並據以建構出最有利於維護或取得該利益的獨立角色。本文將台日雙方鑲嵌於共同面對「中國夢」的背景之中，故所謂自身的實力和相對位置，皆是在意識到中共日漸強大的客觀事實，亦即台日雙方衡量自身獨立角色的標準是以中共為基準所比較得出，以下將 2012 年以後台日各自獨立角色之根源論述之。

一、日本的獨立角色建構

當習近平 2012 年上台成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並於同年提出「中國夢」為出發點，2014 年提出「一帶一路」藉以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擺脫過去鄧小平所制定的「韜光養晦」方針，大大提高了對自我角色的

²² 賴怡忠，〈美中競合格局下的台日關係發展策略 - 如何評價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對台日關係的〉，《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2013 年秋季號，頁 66-67。

²³ 何思慎、楊雯婷，〈結構性限制：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臺日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63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頁 100-104。

期許。同樣在 2012 年，安倍晉三擊敗當時的民主黨政權再次成為日本首相，他曾在 2006 年小泉卸任後短暫接任過首相一職但因健康因素匆匆下台，故回鍋後對中共的基本看法和相關政策皆具有延續性，尤其是他初任首相時提出基於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外交」，在他再任首相後也承繼下來，並發展出「俯瞰地球儀外交」，其內涵為「不僅限於和周邊國家發展雙邊關係，而是如俯瞰地球儀般看向全世界，基於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基本價值，展開戰略性外交」。²⁴ 有研究認為日本外交在 1990 年代接受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為「普世價值」後，在 2000 年代更加速走向「市場原教旨主義」；但中共則認為「普世價值」不應該是西方價值觀，只有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才能稱其為「普世價值」，²⁵ 這使得中日兩國對於所謂「普世價值」有極大的落差，這點也凸顯出安倍強調「價值觀外交」的針對性。安倍二次任期內基於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發展外交的堅持，充分展現出日本作為「民主國家」的角色自我認同。但因為二戰侵華歷史的緣故，日本雖然於冷戰時期與中共處於不同陣營，但一直試圖對中共表示善意，甚至在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傾向上時常領先於美國，但因美國的限制而無法達成。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而言，這會進一步影響到中日兩國間的互動和認同的達成，²⁶ 故這份基於歷史的歉意，使得日本難以在中共面前採取「反極權先鋒」的姿態。

但許多客觀條件已和安倍 2006 年前初任首相時有明顯不同。學者石原忠浩歸納出幾項的差異，首先是自 2010 日本海上保安船與中共漁船擦撞及 2012 年日本推動釣魚台「國有化」以後，造成中共軍艦和軍機「例行性」巡洋釣島周邊更加頻繁，使得釣島問題更加緊張，也使得中共在 2010、2012 這兩年接連產生反日暴動；其次是中日之間的綜合國力優勢逆轉，尤其是在 GDP 方面，在安倍二次就任首相前日本就已拱手讓位；第三點為中共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這有助於緩和中日對立局面。²⁷ 如同前小節所述物質基礎、意識形態、地理位置都

²⁴ 〈安倍總理・所信表明演説～平成 25 年 1 月 28 日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183shoshinhyomei.html>。

²⁵ 余敏浩，〈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六十三期，2018 年 7 月，頁 63。

²⁶ 上村威，〈中日關係：以政治文化為分析框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五十二期，2018 年 12 月，頁 139。

²⁷ 石原忠浩，〈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和對外政策的展望〉，《新社會政策雙月刊》，

是分別影響一個國家獨立角色建構的重要自我評估基礎，所以中共無論在經濟或軍事上，都已經比安倍初次就任首相時更加強大，更關鍵的轉捩點是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這樣的「民族主義式政經權力擴張」模式，不但引起了周邊國家的不安，更刺激美國等強權的警惕，而這也影響日本後續的獨立角色定位。

安倍對「中國夢」的回應，乃是從外交上以價值觀作為拉攏和抗衡的手段，如「積極的和平主義」即是以民主自由價值為本的外交政策，回歸自民黨的傳統以美日同盟為軸心，自 1978 年〈美日共同防禦指針〉以來的美日同盟就逐漸分工，日本的角色從早期狹隘的自我防衛，逐漸演化為對同盟的後勤和人力支援，近期更強調主動與具體的軍事功能，以保障海上生命線與確保美軍航母安全進出東亞區域。²⁸ 積極之處在於為確保世界的繁榮與和平穩定做出貢獻，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相應的修正日本防衛大綱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²⁹ 以擺脫法制面的束縛。安倍特別強調美日安保同盟對東亞區域安全穩定的貢獻和日本身處其中的重要性，代表日本在自民黨重新執政後回到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因此從上所述，安倍二次執政時期為因應中共崛起，最優先建構起的 NRCs 即為日本在東亞的「美國代理人」角色，這既是基於與中共的物質實力差距而須與美保持緊密結合的考量，也是基於與美共享民主價值觀的意識形態根源。

為因應中共國力增長和威脅，安倍二次上任後，跳過中共先出訪其周邊國家，可知安倍有意先與周邊國家修好，並在民主價值以外，附加更多以地緣位置作為另一角色的建構來源。例如 2012 年安倍晉三發表〈亞洲安全保障鑽石構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一文中提到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國家」，日本應該在安全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從地理上連起印度、澳洲、美國和日本的菱形將中共框在其中，以避免讓南海成為「北京湖」(lake Beijing)。³⁰ 2016

第 26 期，2013 年 2 月，頁 7-8。

²⁸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四十六期，2014 年 4 月，頁 55。

²⁹ 〈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3 年 9 月 12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actions/201309/12kondankai.html。

³⁰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年 8 月安倍在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上即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聲明要連結歐亞和非洲「兩個大陸」，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這也是國際社會和平和繁榮的關鍵。³¹ 2017 年 10 月川普政府時任國務卿提勒森 (Rex W. Tillerson) 於「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演說中，也多次使用「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指稱美國和印度的合作必要性，主要是基於中國在此區域的崛起和對國際秩序的挑釁，而美印對全球穩定、和平與繁榮有共同價值觀和遠見，是最適合的合作夥伴。³² 美國川普總統 2017 年 11 月訪日時，安倍也強調美日盟保持海上自由與開放的秩序是維持區域和平和繁榮的關鍵，並在回答記者問題時使用「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一詞。³³ 綜上所述，日本基於「海洋國家」所提出的「亞洲安全保障鑽石」概念早於美國川普政府「印太戰略」，故當相似的概念被川普政府正式提出後，等同得到了事後肯定而能充分配合，並因有共同的價值和地緣戰略目標而樂意繼續落實「美國代理人」的角色。

有學者認為此構想乃是延續 1960 年代以來日本對海洋國家和亞太自由貿易經濟的思辨，從地緣定位自身為「海洋國家」³⁴ 角色的前提下發展，特色有三：首先是對應地緣戰略上中共的崛起，以及其海上軍事力量擴張；其次是強調關係到日本經濟的「海上生命線」，並向外穩定周邊海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強調海上通道的自由航行無阻；第三，從大戰略上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相抗衡，爭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³⁵

³¹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7〉，2017 年 9 月 26 日，頁 5、15，《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3_002228.html。

³² Rex W. 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SIS*, October 28,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³³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okyo, Jap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ember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tokyo-japan/>.

³⁴ 日本身為「海洋國家」具有資源對貧乏，且害怕被封鎖之島國脆弱性。因此特別在意自身於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和影響力，並重視情報收集能力、外交能力和效率性，藉以創造有利的國際秩序和自由貿易環境。詳請可參見星山隆，《21 世紀日本外交の課題 — 外対中外交、アジア外交、グローバル外交》（東京：創風社，2008），頁 333-343。

³⁵ 李世暉，〈日本印太戰略的形成、發展及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 148 期，

從日本進入印太戰略的過程，可看到國家的歷史傳承成為了自我角色建構的來源，基於「海洋國家」的角色進一步制定與其相應的外交戰略。而日本對「中國夢」所追求「海洋強國」的應對，也被包含在維持海上通道暢通的大戰略之中。

在中日國力逆轉的衝擊下，卻因為中日之間的經濟互賴加深且為了維持東亞區域穩定，使安倍僅能以既競爭又合作的方式作為對應。例如 2018 年 10 月安倍晉三帶領 5 百多名工商領袖隨行訪問中國，是睽違 7 年後再次有日本領導人正式訪問中共而非僅止於參加會議，雙方達成重啟雙邊貨幣交換協定、創設先端技術領域合作的平台、簽訂在第三國進行基礎建設開發合作等協議。³⁶ 當時背景為美國川普總統向貿易夥伴國施壓期間，反而推動中日在經貿合作方面跨進一步，並在政治上使雙方破冰，而經濟因素也和二戰以來的歷史因素共同制約日本，使其無法對中採取更強硬政策的主因之一。但 2019 年安倍再次訪中提及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顯見安倍即便無法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但在面對中共時仍不放棄價值觀外交的堅持。

二、台灣的獨立角色建構

台灣政府於 2012 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同年進入馬英九政府的第二任任期，當時馬政府的外交政策秉持二項重點是自第一任以來的「活路外交」，並與中共達成「外交休兵」的共識。³⁷ 從馬英九的政見來看，這兩點是建立在馬政府認為兩岸不必然必須相互衝撞的基本認知上，亦即兩岸關係氣氛良好時，可以藉由相互諒解以避免雙方虛耗過多資源在國際上，藉以有別於前任陳水扁總統時期的「烽火外交」和「麻煩製造者」的國際形象，³⁸ 一方面強調兩岸都不再於國際社會上虛耗資源，隱含的意義在於台灣較難以承受資源浪費，畢竟面對崛起的中共，台灣並沒有足夠的優勢和對岸進行「金錢外交」（Dollar Diplomacy）的競逐；另一方面可以凸顯台灣在民主、人道價值等方面

2018 年 2 月，頁 9-11。

³⁶ 〈安倍訪中 要簽千億日圓 合作協議〉，《中時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5000323-260203?chdtv>。

³⁷ 〈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中華民國總統府》，2008 年 8 月 4 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2472>。

³⁸ 〈馬英九、蕭萬長外交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yNjkzLzAwMjc5MDFfOC5wZGY%3D&n=OTQyNDE3MzY5NzEucGRm&icon=.pdf>。

對世界的貢獻，並吸引更多的國家與我交往，而這也是對台灣自身實力的現實和民主價值比較所得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此的考量乃是馬政府認為兩岸關係良好就能連帶使得台灣的國際空間更為廣泛，故馬政府一直以邦交國幾乎皆維持不斷交、上百國家免簽證和得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O 作為「活路外交」的成就。馬政府時代，基於主觀判斷和兩岸國力的落差加大，台灣不具備與中國硬碰硬實力的認知下，建構出的獨立角色乃是在中美之間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以及在兩岸乃至東亞區域中的「和平創造者」（peace maker）。

有論者認為所謂「外交休兵」只是種政治迷思，並造成邦交國對台灣主權歸屬混淆及後續援助的疑慮，且未能真正擺脫中共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³⁹ 另一方面，原本馬政府時代的兩岸關係走向漸趨統合，但執政末期的「太陽花學運」卻使得這趨勢被迫急踩剎車，在民心思變下即便 2015 年完成了歷史性的「馬習會」也無法再更拉近兩岸間的距離。2016 年蔡英文代表民進黨贏得總統大位，蔡的勝選很大程度上反映著馬執政末期民心對於兩岸趨統的疑慮，故台灣政府政黨輪替後使得台灣的外交定位也隨之改變。蔡政府在外交上推動「新南向政策」，其用意在於盡力擺脫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與東南亞國家發展經貿關係，藉以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得到更大空間。加上美國川普總統於 2016 年底當選後隔年推出的「印太戰略」比歐巴馬總統時代的「重返亞洲」投入了更多戰略資源，並且後來配合貿易戰對於「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式政經權力擴張」進行抑制，這使得台灣在外交和貿易分工上能夠與美國相互呼應，並因地緣戰略的位置恰可處於印太戰略的中心點，對美國的重要性也較以往提升。2018 年 3 月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夾在中間的台商陸續思考將製造基地轉出以避免受到波及，有意移出者當中除少數配合中美脫鉤的科技大廠願赴美國設廠外，多半選擇返回台灣或配合「新南向政策」轉往東南亞，這都幫助蔡政府在建構自身的獨立角色定位時更有自信。

即便台灣政權從馬政府過渡到蔡政府，台灣和中共間的政經實力不斷拉大的趨勢不變，但兩個政府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和角色定位。馬政府自認能夠在中美之間取得平衡，並擔心被排除於中共快速發

³⁹ 廖顯謨，〈馬政府「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政治迷思〉，《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15 年冬季號，頁 179-199。

展的市場之外而選擇深化交往和經貿融合；但蔡政府的方式卻是選擇加速脫鉤深怕被中共徹底融入，並正好符合後來美國的「印太戰略」和貿易戰方向而得益。故蔡政府從經濟物質來衡量，與中共脫鉤有利於向美靠攏並平衡對中共的實力不對稱，故更為堅定的選擇擔任「美國盟友」的角色。而「印太戰略」基於其本身的地緣政治考量，台灣位於第一島鏈中樞的位置恰好是印太戰略的核心，更增添「美國盟友」角色所能發揮的價值。

再從民主價值作為台灣主體意識形態而言，蔡總統於2020年6月受邀參加「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視訊會議及發表演說，呼籲「COVID-19 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及經濟策略的重新布局時，全球所有理念相近民主國家應更加密切合作……且應該善用經濟力量鞏固強化民主……將繼續發展臺灣民主，也會深化與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的關係」。⁴⁰之後又在同年9月出席「凱達格蘭論壇－2020 亞太安全對話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時提到「台灣站在捍衛民主，防止極權入侵的最前線」，可見此時已將台灣自我的角色定位為民主國家中的「反極權先鋒」。2021年蔡英文總統再次受邀參加「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並在演說中加強呼籲「威權國家勢力的擴張使民主價值遭受威脅，全球民主夥伴必須團結合作，共同守護自由、法治、人權等共享價值，確保區域的安全及穩定」。⁴¹蔡政府更凸顯民主國家的身分認同，並欲藉此認同較馬政府更積極擴張結盟的強度，呈現出「反極權先鋒」的自我角色建構。

肆、「中國夢」下的台日互動與雙邊關係

台日關係自1972年以後深受「七二年體制」所制約。「七二年體制」意為1972年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或稱中日關係正常化），於9月29日日中兩國首腦在北京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奠定了日後中、日、台之間的關係體制，日本對於中共所主張「台

⁴⁰ 〈總統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演說 籲全球理念相近民主國家應更密切合作〉，《中華民國總統府》，2020年6月19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62>。

⁴¹ 〈總統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演說 呼籲全球民主夥伴團結合作 守護共享價值、確保區域安全及穩定〉，《中華民國總統府》，2021年5月1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094>。

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不可分割的領土」僅表達「理解和尊重」。⁴²但此後正式的外交關係僅存於中日之間，台日之間受限於此體制僅能保持非官方關係。

台日關係在仍不違反「七二年體制」的前提下，於 2012 年後有所進展，本文以角色理論為途徑，將台日關係依照不同時期，化約為各組的互動角色形式，以此呈現出各時期不同的台日關係特色。在馬政府時期在 2013 年完成解決雙方多年來漁業糾紛的《台日漁業協定》簽署，這過程值得從雙方的互動角色和各自可能的角色衝突分析之。首先，台日間的關係在馬英九總統 2008 年上任初期並不明朗，因馬總統長期支持保釣運動的個人背景，引起日方的疑慮。其次，2010 起中日雙方在釣魚台海域發生擦撞並就主權爭議問題僵持不下，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釣島國有化，引起兩岸政府的抗議，馬總統甚至登上距離釣島僅 140 多公里的彭佳嶼宣示主權，使日方擔心台灣會附和中共一同聲索釣島主權。若從上述台日雙方的獨立角色來推論，日本作為「海洋國家」的角色定位使其不容妥協關乎海洋生命線的釣島主權，而台灣在馬政府時代也堅持釣魚台主權的情況下，兩者應該在釣魚台周邊漁權問題上應該是個沒有共識的僵局。故在釣魚台主權長期以來的爭議當中，台日雙方應是將對方視為「主權競爭者」之互動角色，從角色替代的過程中設想對方也會因為主權問題難以妥協，而可能造成競逐。

但若從實際交涉過程來看，雙方在互動的過程中都顧慮到了中共在此區域的影響力，日本注意到馬政府所經營的兩岸關係前所未有的良好，若堅持主權將可能面臨兩岸共同向日本聲索的窘境。而台灣則是建構起同時在兩岸關係和區域擔任「和平創造者」的角色，在與日本互動過程中，更願意務實地處理兩者之間的爭議，兩岸關係良好反過來影響了日本的決策。使其一方面可兼顧兩岸合作，另一方面也比較不擔心與台灣的合作引起中國的疑慮，最終透過此雙方互動角色的調整而促成《台日漁業協定》的簽訂，順利解決雙方在角色上的衝突。

蔡政府時期台日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升溫，如 2016 年 10 月 6 日，蔡英文總統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表示，「我們（臺灣）跟日本一樣

⁴² 淺野和生著，何義麟譯，〈一九七二年體制下日台關係之再檢討—往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目標前進〉，《台灣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1 期，2007 年 / 春季號，頁 35-36。

都是屬於海洋的國家，也因此海洋事務上，應該有很多共同的問題，還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去發展」；⁴³2016年10月31日，在日本東京召開首次的「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雙方除了交涉「沖之鳥」議題之外，也對漁業合作、海上搜救合作、海洋科技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並正式宣示臺灣建立「海洋國家」的構想。⁴⁴此合作對話持續至2019年共舉辦了四屆，這代表台日基於共同的「海洋國家」角色在擱置了主權爭議後，反而可以取得更進一步的對話和合作基礎。

2017年1月台日雙方相互更改代表處名稱，日方將「日本交流協會」改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台灣方面則將「亞東關係協會」改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2017年3月，日本赤間二郎總務副大臣成為1972年斷交後首位訪臺的現任次長級官員。這當中的主要進展來自於二方面，首先是前述安倍的價值觀外交和蔡政府在面對中國威脅下，同時強調民主自由價值，造就這段期間台日之間將彼此的互動角色界定為「民主價值共享者」。從角色替代來看此互動角色的形成，可以推論當台日雙方設想對方和自己一樣乃是厭棄威權擁抱民主自由的國家時，那麼拒絕來自威權的政治和經濟甚至軍事影響，將可能是共同目標，且能因價值共享而有良好的共同語言。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上台後的「印太戰略」中，台灣和日本都共同支持美國和擔負一定的地緣政治責任，這種間接通過美國所完成戰略價值的共享，除了理念外也兼具了同處於第一島鏈的地緣戰略考量。台日雙方不僅僅是因為各自作為美國的長期戰略盟友，更因為共同面對直接來自中共軍力和行動擴張的威脅。依據日本《令和三年版防衛白書》統計，2020年中共船艦進入釣魚台（尖閣諸島）周邊海域船隻數為1,161艘，認為中共意圖片面改變現狀，⁴⁵而我空軍司令部的新聞稿也公布2020年共機侵擾我防空識別區共計2,900餘架次，這兩項數據都分別超過前一年，顯見台日受到中共軍事壓力增加的事實。⁴⁶故台日雙方既有著共同威脅，又有共同友邦美國的支持，

⁴³ 〈接受讀賣專訪 蔡英文：重啟「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民報》，2016年10月7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b1d05f4b-f453-4b81-a8e8-b1fed0838880>。

⁴⁴ 〈第一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順利舉行〉，《中華民國外交部》，2016年10月31日，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6&s=74163。

⁴⁵ 日本防衛省，〈令和三年版防衛白書〉，頁18，《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000031.pdf>。

⁴⁶ 〈針對媒體報導「中共軍機去年擾台高達5704架次」乙情說明〉，《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年4月2日，<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78407&title=%e5%9c%8b%e9%98%b2%e6%>

在這段期間可以說將彼此的互動角色界定為「準戰略盟友」，這是雙方至今仍未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和軍事關係的現實考量。再從角色替代分別為對方設想，台方可以理解日方為顧及中日間的二戰歷史因素和現實的政經穩定，而不太可能與台締結正式的軍事和外交關係；日方則是可設想台方若與美或日締結正式軍事同盟將嚴重挑戰「中國夢」，而可能引起中共方面的激烈報復，反而不利台海和東亞區域和平穩定，故「準戰略盟友」是雙邊互動關係當下最務實的角色設定。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可整理出前文所提及的台日獨立角色和互動角色如下：日本的三個獨立角色包含：民主國家、美國代理人、海洋國家。台灣的獨立角色在馬政府時期為和平創造者；蔡政府時期有美國盟友、反極權先鋒、海洋國家等三種獨立角色。而台日之間的互動角色在馬政府時期視彼此為主權競爭者；蔡政府時期則相互設定為民主價值共享者、準戰略盟友、海洋國家等三個互動角色。

藉由台灣和日本各自對於獨立角色的認定以及對彼此互動角色的認定，決定台日雙邊關係所呈現出的樣貌。本文的研究推論過程中也同時納入了中共和美國因素，主要發現在於，細觀台日各自的獨立角色，或多或少與後續雙方的互動角色有所連結，像日本的「民主國家」獨立角色和台灣同樣基於民主體制的「反極權先鋒」獨立角色，使得雙方在理念相近的前提下使彼此互動時可被歸類為「民主價值共享者」。第二個發現是，兩者的獨立角色或是互動角色的歸類，都可看到中共作為重要他者無所不在的背景影響，例如日本的獨立角色是相對於中共的威權統治（相反角色）而得出相反的「民主國家」；台灣的獨立角色亦相對於中共作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得以凸顯出「美國盟友」的獨立角色。第三個發現是兩者對於自身的獨立角色和互動角色間不一定一致，甚至有所衝突。例如台日雙方長期以來對於釣魚台主權就有歷史爭議並維持「主權競爭者」的互動角色，而這和基於同屬美國友邦所延伸出「準戰略盟友」的互動角色是有所衝突的，但在共同面對「中國夢」所帶來的壓力時，就使得「主權競爭者」的角色受到淡化和擱置，並基於共同的「海洋國家」屬性對於漁權進行合作對話。第四個發現是，從馬政府過

b6%88%e6%81%af&SelectStyle=%e6%96%b0%e8%81%9e%e7%a8%bf。

渡到蔡政府後因為雙方更加強調民主國家和海洋國家的獨立角色，故台日兩者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以及海洋國家屬性，使得彼此的獨立角色和互動角色得以交流，擴大了彼此對話和合作的基礎，造就出台日關係的新面貌。

雖然本文從台日雙方各自面對「中國夢」的共同背景下，歸納出各自的獨立角色和從雙方互動中整理出互動角色，獨立角色可從各自與中共實力對比和相對位置以及意識形態、價值理念差異等客觀比較而來，使得無論台日各自的獨立角色當中都有突顯民主自由價值的部分，但互動角色更容易受到中共因素的制約，限制彼此在互動關係中向另一方接近的程度，尤其是日方比台灣更易受影響。在兩岸關係緊張的蔡政府時代，台日關係的互動其實面臨了更大的壓力，尤其在 2018 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共極力改善與日本的關係以避免陷入孤立，甚至原本已達成 2020 年春季習近平訪日並可能簽署政治文件的協議，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作罷。這段期間日本政府陷入在兩岸之間維持平衡的兩難，使得安倍在其任內未能與台灣有更進一步的象徵性突破，可見即便台灣與符合安倍「價值觀外交」為共享民主法治價值的天然夥伴，且安倍個人在情感上和傳承自外祖父岸信介的外交理念使他一直傾向台灣，⁴⁷ 但也不得不顧慮中共因素的影響。至少分別從美國和日本的對台作為比較，日本至今未能如美國讓部長級現任官員訪台，不可能採取如美國軍機來台的舉動。故從台日的互動角色觀察安倍政府和蔡政府時期的台日雙邊關係，可說是將彼此的角色視為「民主價值共享者」，並且因為皆被美國納入「印太戰略」之下而有更為緊密的戰略利益共享，而由此所延伸出間接的「準戰略盟友」，但不代表日本方面能夠徹底擺脫中共因素的制約，進而超越雙邊代表處改名，和台灣走向更實質的外交承認甚至軍事同盟關係。

總結本研究藉由角色理論所勾勒出的台日關係與角色互動的輪廓如下：本文發現「中國夢」的提出是台日互動深度在安倍二次執政時得以超過其個人前一任期的的關鍵點。因為台日共同面對中國「民族主義式政經權力擴張」實質影響，這使得台日在各自發展出基於民主價值和地理位置的獨立角色時，又能在美國以「印太戰略」抗衡「中國夢」的助攻下，加強台日對彼此互動角色的共識和認同，進而在雙邊關係上發展

⁴⁷ 丹羽文生，〈安倍外交と台湾 — その政治的系譜 —〉，《問題と研究》，第 47 卷 2 号，2018 年 4、5、6 月，頁 163-164。

出挑戰「七二年體制」極限的進展。簡言之，當前台日關係即便尚無法真正突破「七二年體制」限制，「中國夢」的提出仍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關鍵因素，雖然其本身乃是習近平以中共內部政治考量為主的政策宣示，但卻引起美國等強權的警惕和加強盟友間的經營，甚至造成台日在內的周邊國家不安和深化合作，這恐怕是習始料所未及。

最後，角色理論用於雙邊關係的研究過程，乃是綜整資料後提取歸納而成的抽象隱喻並加以驗證。故角色的塑造必須要來自該行為者過往的行為和言詞整理，才能精準的加以提取並賦予最適合和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也才能研判該角色與他者互動時的正確反應和預測下一步行動。這方面或許或會受到研究者的學術養成和認知偏差影響，需要吾人更加細心的整理和推論。

參考書目

壹、專書

K. J. Holsti 著，李偉成、譚溯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王康主編，《社會學辭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沈旭暉著，劉永艷、爾雅譯，《解構中國夢 - 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Dream: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

K.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Stephen G. Walker,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

Walker, Stephen G. 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星山隆，《21世紀日本外交の課題 — 外対中外交、アジア外交、グローバル外交》（東京：創風社，2008）。

二、學術性期刊論文

上村威，〈中日關係：以政治文化為分析框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五十二期，2018年12月，頁129-154。

石原忠浩，〈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和對外政策的展望〉，《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26期，2013年2月，頁7-8。

何思慎、楊雯婷，〈結構性限制：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臺日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63卷第3期，2020年9月，頁100-104。

余敏浩，〈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六十三期，2018年7月，頁29-63。

李世暉，〈日本印太戰略的形成、發展及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148期，2018年1、2月，頁9-11。

- 李世暉，〈臺日關係中「國家利益」之探索：海洋國家間的互動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八卷第三期，2017年7月，頁1-40。
- 淺野和生著，何義麟譯，〈一九七二年體制下日台關係之再檢討—往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目標前進〉，《台灣研究季刊》，第3卷第1期，2007年/春季號，頁35-65。
-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四十六期，2014年4月，頁43-64。
- 過子庸，〈日本「311大地震」十週年臺日關係之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11期，2021年11月，頁90-109。
- 廖顯謨，〈馬政府「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政治謎思〉，《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4期，2015年冬季號，頁179-199。
- 賴怡忠，〈美中競合格局下的台日關係發展策略 - 如何評價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對台日關係的〉，《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9卷第3期，2013年秋季號，頁49-70。
- 龐絢，「國際角色的定義和變化_一種動態分析框架的建立」，《國際政治研究》，第1期，2006年，頁133-134。
- Harnisch, Sebastian,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1, January 2012, p. 49.
- Holsti, K. J.,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3, September 1970, pp.233-309.
- Huang, Chiung-chiu, "Interpreting Vietnam'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Independent Role Versus Interactive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ume 34 Issue. 4, February 2020, pp. 524-543.
- Shih, Chih-yu, "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 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January 2012, pp. 71-91.
- Thies, Cameron G., Marijke Breuning, "Integrat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ole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1, January 2012, pp. 1-4.

丹羽文生，〈安倍外交と台湾 — その政治的系譜 —〉，《問題と研究》，第47卷2号，2018年4、5、6月，頁163-164。

三、網際網路資料

〈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3年9月12日，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actions/201309/12kondankai.html。

〈安倍訪中 要簽千億日圓 合作協議〉，《中時新聞網》，2018年10月2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5000323-260203?chdtv>。

〈安倍総理・所信表明演説～平成25年1月28日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3年1月28日，
<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183shoshinhyomei.html>。

〈針對媒體報導「中共軍機去年擾台高達5704架次」乙情說明〉，《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年4月2日，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78407&title=%e5%9c%8b%e9%98%b2%e6%b6%88%e6%81%af&SelectStyle=%e6%96%b0%e8%81%9e%e7%a8%bf>。

〈馬英九、蕭萬長外交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yNjkzLzAwMjc5MDFfOC5w-ZGY%3D&n=OTQyNDE3MzY5NzEucGRm&icon=..pdf>。

〈接受讀賣專訪 蔡英文：重啟「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民報》，2016年10月7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b1d05f4b-f453-4b81-a8e8-b1fed0838880>。

〈第一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順利舉行〉，《中華民國外交部》，2016年10月31日，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6&s=74163。

〈習近平：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 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人民網》，2013年8月1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01/c64094-22402107.html>。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網》，2013年3月18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18/c64094-20819130.html>。

〈總統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演說 呼籲全球民主夥伴團結合作 守護共享價值、確保區域安全及穩定〉，《中華民國總統府》，2021年5月1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094>。

〈總統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發表演說 籲全球理念相近民主國家應更密切合作〉，《中華民國總統府》，2020年6月19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62>。

〈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中華民國總統府》，2008年8月4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2472>。

Abe, Shinzo,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Tillerson, Rex W.,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SIS*, October 28,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okyo, Jap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ember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tokyo-japan/>.

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7〉，2017年9月26日，《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3_002228.html。

日本防衛省，〈令和三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
<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000031.pdf>。